

赴一场千年之约 做一次跨文明对话

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用独特的对比视角，找到了两个文化高峰的对比坐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 张玉玲 宋喜群

8月31日，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在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与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行节闭幕式上，1000多名观众共同观看了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共同领略两座人类艺术高峰的神奇壮美，共同接受一次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的文化洗礼。

民心相通的高远立意

原本担心100分钟的纪录片会给人以拖沓冗长之感，可当精美的画面投放到大屏幕上，雄浑的音乐响起时，千人的现场鸦雀无声，纵横于千年时空，时间仿佛凝固了。观众仿佛穿梭徜徉于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和世界上最大的寺庙柬埔寨吴哥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文化的甘露和滋养，100分钟瞬间即逝。

“这部片子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独特的对比视角，找到了两个文化高峰的对比坐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一语中的。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纪录片总导演秦川也坦言：“最难的也最需要做的是，努力寻找两大世界遗产的文化链接。”远隔千山万水，莫高窟是沙漠戈壁中的绿洲圣景、千年营造的精神家园；吴哥窟是热带雨林中千年久远的信仰圣地。如何把它们放在一个交汇的坐标，一个比照的维度来呈现？

“因为对话，文明不会消失；因为微笑，世界永远和平。”纪录片导演安秋在阅读大量史料后，找到了莫高窟和吴哥窟共同的“魂”：同为海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都与丝路共兴衰、同荣辱，都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亚洲艺术高峰。要通过两个文化命运相通、文化相通、艺术相通的奇妙关联，阐明“民心相通”的时代主题，进而揭开莫高窟和吴哥窟带给人类的伟大启示，体现“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柬埔寨王国文化艺术部大

臣彭萨格娜也被这部纪录片打动了，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纪录片，促进两地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入交流。她说，今年开启了首届“中国——柬埔寨文化旅游年”，于柬埔寨而言，将促进文化旅游增加创收、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和促进文化认同；文化旅游也促进民心相通，让柬埔寨充满魅力，令各国游人欣然前往，其中中国游客位居榜首。

开放包容的文明互鉴

一边是莫高窟第328窟的供养菩萨塑像，端庄沉静；另一边是吴哥阇耶跋摩七世笑臉，慈悲大气。现场的大屏幕上，这两张经典面孔相互遥望、无声交流，烘托了《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主题。

这两张面孔，代表两个世界级别文化遗产，虽然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两大文化奇迹却诞生于同样的信仰；同样在历史中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曾沉寂破败过，又同样在19世纪的文明进步中被重新发现、传播、保护、研究、欣赏。“两窟相似的历史境遇中，沉淀了

‘一带一路’沿线文明兴衰的历史反思。”艺术总监周兵庆幸参与这样一部作品，探寻文化之美、历史之变。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担任纪录片上下两集的学术主持，他带领团队在柬埔寨，顶着吴哥旱季少见的40℃高温，挥汗如雨，在丛林中拍遍了吴哥六大遗址群。后来又到巴黎吉美博物馆探访两种文化“艰难的相遇”。回国后，他从建筑、雕像、壁画、图案等多方面将吴哥窟与莫高窟进行对比。他总结了文化发展的密码：因开放而繁荣，因封闭而沉寂。明嘉靖年间关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龕亦为沙所埋”；明朝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之后，海上丝绸之路衰落，吴哥也繁荣不再。

赵声良认为，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赴一场千年之约，做一次跨文明对话。”为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挖掘两大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由甘肃省府精心策划和大力推进。据甘肃省文旅厅厅长陈卫中介绍，今年为期一个月的敦煌“一会一节”更开放，迎来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泰国、澳大利亚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节、商协会代表，共商丝绸之路国家发展机遇，共话沿线国家共赢大计。

绵延千年的文化精神

“在逼仄的机房打磨影片子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像走过了一条朝圣之路，和莫高窟的画工、吴哥窟的石匠对话，和千千万万造就了这两大文明的无名匠人对话。”导演藏敬说，在制作纪录片时，每当想起这些默默无闻的文化创造者，心里就肃然起敬。

“敦煌的沙漠中看不到花，但莫高窟的壁画中却看到了形态各异、五彩斑斓的花”。纪录片中再现了少女常沙娜随父亲常书鸿初到敦煌的场景。今年88岁的常沙娜老师看纪录片时，眼中泛着泪光，她说父亲和他带领的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西北边陲敦煌，再也没有回去，从青丝到白发，最后还献出了生命。

三危山下、泉泉河边，有一片敦煌研究院公墓区。这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逝后也永远地守护着莫高窟。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把这种精神总结为“莫高精神”。已在大漠工作56年的她在研究上，推动敦煌研究院从成立之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艺术研究、文献研究、民族宗教研究等多学科研究；技术上，推行“数字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从响彻千年的开凿声，到千百万没有名字的画匠和石匠，再到长眠的守护者，前赴后继，文脉就这样静水流深，沧桑踏歌，文化就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今 雨 轩

工艺人应成为创造者

□ 谷 泉

近几年，文创产品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新宠”。600岁的故宫迷倒“90后”，3D打印等高新技术在文创领域广泛应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匠二代”等工艺人投身文创实践，在传统工艺文化耳濡目染中长大的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年轻人，总是要做点不一样的！”

新一代工艺人登台亮相，首先体现了工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工艺几度春风，历史上不受重视的工匠，获得尊重和推崇。特别是各级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不但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地位，也提高了工艺人的社会知名度。手工劳作者地位的提

高，是对个体创造力的肯定，直接推动了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有家传的第二代从业者，“匠二代”等新一代工艺人投身文创领域，甚至自创品牌，更体现了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的释放。上世纪一段时期内，工艺的传承大多还停留在师徒传授等传统方式中，许多人没有经历提升创造力的系统训练，很难赋予作品符合时代的思想内涵。传统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运行的状态。

老一辈工艺人被社会寄予厚望，但当他们想创造，自认为能够创造，深感必须创造的时候，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让“匠二代”得到比老一辈工艺人更多的文化雨露滋养。尤其是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

培训计划”，让包括工艺人在内的非遗传承人群能够进入高校学习，不仅提高了传承能力、传承水平，拓展了工艺人的视野和眼界，也大大增强了包括“匠二代”在内的年轻人对工艺文化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工艺人从手工劳作者到创业者的华丽转身成为可能。

新时代，工艺人应成为创造者，而不只是制造者，更不应做复制者。从新一代工艺人投身文创的热情看，可以聆听到时代对工艺文化创新的呼唤，可以窥见年轻一代工艺人主动求变的热切愿望。对于接受过系统学院教育的年轻一代工艺人而言，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重复祖辈的传统工艺制作。物换星移。他们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飞跃的时代，就工艺的生态环境而言，与农耕文明中完整、平稳的生态相比，当下的工艺生态更加跌宕起伏。生产力变革改变着工艺生态。新的生产关系，孕育不同的造物理念。中国工艺生态的转变，理应鉴往知来、高瞻远瞩。

作为工艺大国，中国有变革的勇气，这既依赖于从业者的辛勤耕耘，又依靠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才方面的核心理念非常朴素，就是中国工艺人应该成为传统工匠难以成为的一个大写的、完整的“人”。开放的中国，早已打开了年轻一代工艺人的视野与心胸。他们对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葆有的热情，点亮了文创事业的蓝图，值得期待与欢呼。

文化资讯

良渚遗址“全新亮相”中学教科书

本报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学期伊始，翻开新发的历史课本时，全国不少地方的七年级学生就能看到良渚遗址的最新介绍。

这本课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它以约一页的篇幅介绍了古城、水利系统、玉器良渚遗址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除了这本教材外，人教社出版的高中数学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也有良渚遗址的介绍。如数学教材在讲解指数函数和对数函

数时，就引入了对良渚出土遗存进行碳14测年的案例。

“80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已充分证明，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是存续于距今5300年~4300年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区域性国家的中心。”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此次把良渚遗址写进教科书，有利于广大青少年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展示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也对做好良渚遗址保护、良渚文化传承意义深远。

（唐 强 冯 源）

儿童剧《我的妈妈是匹马》将上演

本报讯 记者任丽梅报道 9月4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儿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原创儿童剧《我的妈妈是匹马》正式建组。该剧讲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一群在草原上自由生活的马儿被征召奔赴战场，护送136个孩子从战场撤离并返回家乡的故事。

据介绍，《我的妈妈是匹马》由北京演艺集团（以下简称“京演集团”）出品，北京儿艺制作并演出。这部儿童剧讲述的是一群马与一群孩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爱与恨、亲情与友谊的故事。该剧特邀81岁高龄的知名导演艺术家陈新伊亲自执导，也是陈新伊时隔近20年后再度与北京儿艺合作；舞台设计由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主任、国际戏剧联盟主席张庆山教授担纲；独立编舞邀请了上海业界知名

的舞蹈设计江帆女士。据了解，《我的妈妈是匹马》是北京儿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又一部原创大戏，同时也是京演集团在艺术创作之路上砥砺前行十载年华的硕果展示。改制10年来，京演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京演人秉承着与时俱进的坚定信念，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作为京演集团旗下的一员，北京儿艺始终坚持着“执着原创艺术，追求完美品质”的创作宗旨，为少年儿童群体创作了一批体现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人民审美追求，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文艺作品。据悉，《我的妈妈是匹马》目前正在北京儿艺排练场进行紧张有序的排练。将于2019年10月13日在中国评剧大剧院进行首演。



无声世界里陶艺在“说话”

黄永是山东临沂银光文创黄永陶艺工作室的负责人兼设计师，2004年毕业于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他虽是一名聋哑人，但却利用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让陶艺作品在他无声的世界里替自己“说话”。2005年，黄永到北京拜访陶艺老艺人学习陶艺创作，2012年10月，他创建“黄永陶艺工作室”。多年来，他在陶艺上不断精益求精，多次承担沂蒙精神红色文创工作，用陶艺作品展示沂蒙革命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及精神风貌，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省、市奖项。图为黄永创作的陶艺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 凯 摄

艺海钩沉

□ 陈俊珩

蔡斯民是新加坡人，从小爱好中国传统文化。上世纪80年代，他借着来中国拍摄广告的机会，拜访了一些画家。他发现，不少已经作古的著名国画家比如齐白石等人都没有专业的摄影照片传世。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尚健在的、有影响力的老一代中国画家拍摄生活艺术像传。所谓“像传”，不只是拍画家们伏案创作的场景，还要记录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点滴以及他们的精神与性格。

1985年，刘海粟到新加坡办画展，蔡斯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刘海粟听后非常赞赏，并建议这组作品可以取名“留真”。在朋友李行简的帮助下，蔡斯民又找到了知名美术史家黄苗子，他们根据年龄并参考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等因素，最终确

“留真”——记镜头里的那些画家

定了14位拍摄对象：朱屺瞻、刘海粟、黄君璧、赵少昂、陈文希、王己千、李可染、叶浅予、吴作人、陆俨少、谢稚柳、黎雄才、唐云和关山月。“留真”系列一共留下了84张照片，按下每个快门只需1/30秒，蔡斯民却拍了近5年。在这批加起来拍了总共不过几秒钟的照片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精心的策划。

与画家初次见面时，蔡斯民并不急于拍摄，而是先深入研究其作品，阅读有关资料，并与画家及其朋友、学生交谈，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和喜好，然后再营造出“接地气”的场景。“我是每件作品背后的总策划人。”蔡斯民说。

朱屺瞻是这14位画家中年纪最长的一位，蔡斯民记得，时年90多岁的朱老非常慈祥。他听到朱老酷爱菖蒲，他便送上菖蒲到朱老的住所，当他在窗前洗剪菖蒲时，蔡斯民按下了快门，留下了“与翁共伴长青”的画面。听学生说，朱老喜欢评弹，蔡斯民又邀请评弹演员章凤珠去朱老家做客，朱老欣赏评弹时的喜悦之情就这样被镜头真实记录了下来。

得知画家唐云喜爱吃螃蟹，蔡斯民特意买了几只螃蟹登门。唐云很高兴，顺手画了一幅螃蟹、酒罐和秋菊，吟道：“蟹初肥，花正好，酒瓮空，人醉倒。”餐桌前，唐云举杯畅饮，

蔡斯民提前用三脚架定好位置，一边与他喝酒，一边拍下了艺术家举杯的潇洒之态。

在蔡斯民的印象中，最难拍的人要数李可染，“他在相机前很紧张，要把他拍得自然不容易。”李可染说话的声音很小，为人亲切，在他家中吃过两三次饭后，两人便熟络起来。李可染擅长用墨，其山水画的墨色非常厚重。他不仅喜欢用墨，还喜欢收藏古墨，在向蔡斯民展示自己珍藏的老墨时，李可染的表情非常松弛，蔡斯民立即拿起相机，捕捉这一瞬间。

最有意义的作品来自最难拍摄的对象。陆俨少与李可染